



邓小平决策浦东开发台前幕后

邓小平第三次在上海过春节

1988、1989年,邓小平连续两年在上海过春节。1990年是第三次,与前两个春节相比,上海人都希望他好好休息一阵子,因为在这之前两个月,邓小平在北京正式宣布退休。

然而机会难得,该请示汇报的事不能不做呀!但选择何时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和请示合适呢?

机会来了——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晚邓小平两天来到上海视察。时任上海市委书记、市长朱镕基通知常委和几位老领导,当晚开个碰头会,商议如何向邓小平、杨尚昆汇报浦东开发的事。最后大家一致推荐市委老书记陈国栋先给杨尚昆汇报,争取得到杨主席的支持,再进而得到邓小平的支持。

“方略”是这样定的。陈国栋资格老,又在解放前后跟杨、邓首长们比较熟,由他去请示汇报最合适。“没说的。为了浦东和上海的事,我跟两位老领导去磨……”老将陈国栋表示。

“开发浦东,我赞成”

结果比预想的好。杨尚昆听完陈国栋关于浦东开发的所有思考与准备及推进情况后,说:“这件事非常好,回头我去对小平同志说。”

很快,杨尚昆到了邓小平那儿。两位对浦东开发意见完全一致,邓小平态度非常鲜明:“‘开发浦东’还应加上‘开放’两字。”

关于1990年邓小平对“浦东开发”的意见,作为亲历者的汪道涵有这样一段回忆:

1990年4月18日,中国向全世界宣布了一件大事:上海浦东将全面开发开放!这被外界称为继深圳之后的中国改革开放又一个划时代意义的事件。而这一事件同样又是被尊称为改革开放“总设计师”邓小平的杰作。



那几年,大概从1984年开始,每次小平同志到上海来,我们都得到一个机会,向他老人家来反映“上海向何处去”的问题。当时上海市委的陈国栋、胡立教,上海市政府的我和韩哲一,我们就经常在研究“上海向何处”。我们从1983年、1984年就开始提出要来开发浦东,我们是从整个上海的浦东来考虑的。结果到了1990年春天,小平同志到上海,我们把这个意见反映给小平同志。小平同志说这是个好事情,他说这个事情早该如此了。他当时说:“可惜,迟了五年。”

迟了并不要紧,上海的基础好,人才多。长江三角洲自然条件好,交通方便。要发挥这些优势,带动区域经济,从而带动和辐射到全国的大发展。小平同志对上海始终抱有极大的希望。

春节的日子一晃而过。2月13日,邓小平要回京了。朱镕基、黄菊、王力平等市里的领导送行。据市委副书记王力平回忆:在汽车上,邓小平和卓琳(小平夫人)坐在第一排,毛毛(小平女儿)和朱镕基坐在第二排。途中,邓小平转过身来,很严肃地跟朱镕基说:“你们提出来开发浦东,我赞成。”

朱镕基大喜,向邓小平拱手致谢。送上火车后,临别

时,邓小平握住朱镕基的手,又一次重复道:“你们开发浦东,我赞成!”

关于这段对话,在《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》一书中,朱镕基自己有详实的记载:

我送小平同志走时,在车上他的几句话对我们鼓舞很大。他说:“我一直就主张胆子要放大。这十年以来,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开放,要胆子大一点,没有什么可怕的,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因此,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。”另一句话说:“你们搞晚了,搞晚了。”马上,下面一句话又说:“现在搞也快,上海人的脑袋瓜子灵光。”他还说:“肯定比广东要快。”

上下沟通达成一致

回到北京的邓小平,为了浦东的事,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跟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强调“浦东开发”这事。

上海市于1990年2月26日正式向中央提交《关于开发浦东的请求》。这看起来已是万事大吉了,但邓小平仍然生怕拖延和耽搁,3月3日这一天,他邀来时任总书记江泽民、总理李鹏到他家,就当时的国内、国际形势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,而谈话中用了很长篇幅讲到了浦东开发开放问题。

邓小平在与江泽民、李鹏的谈话中说:“比如抓上海,就

是一个大措施。上海是我们的王牌,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。”后来又把聚焦点集中到了“浦东开发开放”这张具体的“王牌”上。

成为世界性话题

邓小平以卓越的政治家远见,以扭转乾坤之势,一锤定音,将“浦东开发开放”的王牌抛出,顿时令世界为之一震,从而让中国迅速摆脱了国内外的困境,重新走上了大发展的轨道。

在邓小平的推动下,中央对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和行动立即“提速”。3月28日,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受江泽民、李鹏委托,率领国务院特区办、国家计委、财政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经贸部、商业部、中国银行等部门的负责人来到上海,进行专题调研与论证。

4月14日,时任总理李鹏开始上海考察之行。在18日最后一天参加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5周年的庆祝大会上,他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: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,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。

李鹏特别强调,这是我们为深入改革、扩大开放作的一个重大部署。对于上海和全国都是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事。

“王牌”甩出,世界震动。

时间,上海和浦东成为一个世界话题。(摘自《浦东史诗》何建明/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)

命令教育部门制订出简化汉字的方案。就在蒋介石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时,国民党中央委员、著名学者胡秋原站出来极力反对。胡秋原认为:汉字是汉文化的载体,是中国文化之根,已使用了几千年,书写时并没什么不便,完全没有必要简化。简化汉字就是破坏中国文化,谁简化汉字,谁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。

胡秋原的主张立即得到台湾文学界和史学界的大力支持,大伤脑筋的蒋介石感到推行简化汉字的阻力实在太,便指令有关部门以后不要再提此事。

(摘自《文史博览》张达明/文)

大清“中国制造”为何大衰退

大清王朝的坍塌,是一个漫长的、骨架被一根根抽去的过程,最为致命的是经济的衰退——引领世界数百年的“中国制造”的衰退。

与大多数后人的想法当然不同,即便是两次鸦片战争,也没有能够击垮中国商人在诸如茶叶、丝绸等大宗商品上的定价权。根本原因十分简单:中国的茶叶、丝绸是西方的生活必需品,其需求相当刚性,是典型的卖方市场;而西方的商品,主要是毛皮、钟表等奢侈品,并非中国的必需品,其需求弹性很大,是典型的买方市场。

鸦片战争之后,“行商”制度被取消,但是,一个名为“买办”的群体,取代了“行商”的地位,它虽然远比“行商”松散,缺乏公权力的保驾护航,但也因此获得了更为坚韧的生命力。西方的坚船利炮,固然能令天朝政府屈服,但商业本身却不是靠大炮能够完全左右的。中国内地相当原始而复杂的商业环境、强大而顽固的“行会”,以及极度匮乏“国际惯例”的金融体系与法制体系,令外商望而生畏。种种制约之下,外商们只能雇请“买办”深入内地,这种被称为“内地采购制度”的体系,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,成为中国

外贸的主流模式。

导致中国定价权丧失的,有两方面原因。鸦片战争之前,中英双方就围绕茶叶质量问题发生多次贸易冲突,这一方面因为中国商人相当普遍的以次充好,另一方面亦是英国人通过压低茶叶等级,试图对华商的定价权发起挑战。1819年11月,英国人对23.1万箱茶叶进行质检,退回了其中的7.6万箱,高达32.9%。而在所接受的15.5万箱中,只有2.3万箱被列为“普通上至仅达中等”,不到10%;其余都是“普通上”或者“勉强达到普通上”。

“大清制造”的质量问题,一直是外贸冲突的焦点。虽然英国的茶叶安全问题,主要是其本土的不法商人造就,如英国商人大量回收茶叶渣经过化学加工再冒充新茶卖给英国人,并称之为“绿色茶”。但这并不妨碍英国人以这张“绿色牌”挑战中国茶叶,那些在茶叶短缺年代被中国茶商有意无意忽视了的质量问题,此时都被一一挑选出来,作为商战的武器。

质量之外,交通与通讯革命带来的新常态,也令大清商人无法适应,加剧了定价权的流失。1869年,苏伊士运河开通,并且规定只准蒸汽轮船通

行。大量的蒸汽轮船迅速地取代飞剪船,投入东西方的航运。在中国出口额中占了70%~80%比重的英国,从伦敦直航上海的航程由120天以上缩短到55~60天。中国茶叶经由蒸汽轮的快速运送,更能保鲜,因此伦敦市场已不再需要维持6~12个月的茶叶库存,茶叶的国际需求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

1872年,伦敦市场茶价下跌,外商的进价依然接受华商的控制,因此遭受重大损失,深深刺激了外商。也就是在这一年里,英国《整治假货法案》经修订后实施,英国商人们对中国茶的品质担忧迅速上升。经过中英双方的大量博弈,1872年的当年绿茶报价,只相当于过去2年的半价水平,这标志着中国

商人的茶叶定价权正在迅速失去。

交通之外,通讯变革也在发生。1871年开通的中国(上海和香港)和英国(伦敦)之间的越洋电报,不仅令行情能够迅速传递,外商可以根据电报开始经营买空卖空的“期货”,而且也令越洋调查生意伙伴的资信成为可能。

导致中国对大宗外贸商品失去定价权的,不是军事上的失败和政治上的腐败,是技术性的产能过剩、金融落后、质量低劣。更为严峻的是,当外交军事的惨败推动大清国财政成为“赔款财政”时,丧失定价权所带来的经济衰退,既影响了经济层面的造血功能的同时,更在政治层面上有着致命的伤害。

(摘自《国家人文历史》雪珥/文)

才气还须苦力抬

村上春树的小说《海边的卡夫卡》,跟他大部分的作品一样,一出版就是所向披靡,获选为日本年度最有影响力的小说。

他一向躲避媒体追踪,为了新小说的出版,勉强接受记者访问。谈到他写这本书的过程,以为作家依靠灵感或才气完成作品的读者,听了他的说法必然十分意外。他说,这本书足足写了半年,一天也没放假,每天早上四点起床,写到九点,至少会写五个小时,也还得写满十张四百字的稿纸才停笔。为了有强壮的意志力和健康的身体可以写作,他还有每天慢跑几个小时的习惯。

你一定会想:这简直像在行军嘛!

其实,村上春树并不是特殊的案例。

不久前,有位屡屡得到国际艺术大奖的法国绘本艺术家斐德里克·柯雷孟来台湾,接受访问时也说,他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画图,晚上十点上床睡觉,像是在做苦工,完全没有一般法国人的浪漫社交生活。自开始写与画以来,几十年从未间断。

当然,创作并不是只需悬梁刺股的毅力,还要有才华做基底。但在看过许多艺木家或作家传记、访问稿后,



我大略可以完成一个有趣的归纳:成功且长命的艺术创作者,多半过着规律而自制的生活,不成功或短命的艺术家,则多半活得酒色无度、荒诞不经。

才气和灵感都像一顶漂亮的轿子,没有引擎也没有轮子,不管有多炫丽,总要有“做苦力”的人来抬轿,才能走远路。

“煮豆燃豆其,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,相煎何太急?”听过三国时代才子曹植七步成诗的故事,都会羡慕他的灵感与才华。没错,他是很有才华,我们可曾想过:在那首短诗之前,他还写过多少诗,又读过多少诗书?他下的苦力,不只在那“七步”而已。

有一本研究天才的书曾做过统计:任何一种天才,都需要经过一万个小时以上的专业琢磨,才能真正成器。你可曾算过,你对自己的专长花过多少小时,才有今天的业绩?

致命的钥匙

虽然已过去百余年,但与泰坦尼克号相关的话题,依然活跃。在那场海难中,有1500余人葬身海底。假设时光倒流,改变事故中的某些细节,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幸免于难?

一把被拍出高价的钥匙,让人们更加热衷于讨论类似的问题。这把钥匙用来打开泰坦尼克号上的救生衣柜,当时由船上的一名三等舱乘务员保管。在船撞上冰山后,他是否用这把钥匙打开了救生衣柜?事实上,就算有更多的人穿上救生衣,那场浩劫也难以避免。在冰冷的海水中,落水者即使不溺亡,也会因失温而死。

还有一把钥匙,是用来打开上舱和下舱之间的铁门的,在泰坦尼克号邮轮职员身上。险情发生时,他迅速打开了那道铁门,让一些人得以逃生。不幸的是,这名邮轮职员自己并没有挤上救生艇。这

把挽救了很多人的钥匙以及他随身携带的一块怀表,后来被救援人员找到。诡异的是,泰坦尼克号断成两截沉入海底的时间是凌晨2时20分左右,而这块怀表的指针停在了2时16分。是他的表慢了,还是另有原因,我们已无法得知真相。

被认为对这场悲剧负有责任的,是用来开启驾驶台望远镜柜箱的那把钥匙。这把钥匙在高级船员戴维德·布莱尔身上。他原本是泰坦尼克号首任二副,驾驶巨轮完成了从建造地到母港南安普顿的试航。可就在泰坦尼克号首航前一天,布莱尔被调离。由于走得仓促,他忘了把那把钥匙留下。据幸存的船员说,因为没有望远镜,在行驶途中,船上的瞭望手只能通过目视观察前方情况,以致没能在安全距离之内及时发现冰山的存在。

(摘自《读者》)